考古人類學刊・第 84 期・頁 111-144・2016
DOI:10.6152/jaa.2016.6.0004

市場化的青春：
青春作為中介移民打工的社會機制

方 怡 潔*

摘 要

本文試圖透過深圳一家台商廠青年農民工的處境與他們對未來的夢想與決定，來探討青春如何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機制，合理化了當代中國青年農民工在社會上無處安身、有夢卻找不到路的處境。乍看之下，市場化後的「青春」將越來越朝個人主義發展，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個體性，但實際上，卻弔詭的成為國家、社會與市場用來合理化社會不平等並馴化青年為其發展計畫服務的社會機制。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讓個體的生命歷程又再次經歷了標準化過程，亦即，理想的童年、青年、老年的過程與內涵，及個體在其中所經歷的任務與挑戰都發生改變。做為消費、移民與社會變遷的主體，青年與青春特別被突顯出來。本文將從市場化後青春的內容與任務的轉變談起，從農民工的角度看青春標準化工程如何被經歷。一方面，我耙梳這樣的青春標準化過程如何滲入日常生活的實踐運作裡，把農民工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個人化」。另方面，則呈現青年農民工是如何援引青春的兩面性，來對他們面臨的多重價值矛盾並存的處境「製造意義」。市場化的青春因而扮演了一個不應忽視的中介協調機制，在當代中國變遷社會中，去削弱了青年農民工在面對勞動剝削、政策歧視、以及發展不均時反彈的力道。

關鍵字：青春、移民打工、農民工、全球市場、發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84 : 111-144 • 2016

‘Marketized’ Adolescents: When Adolescents Become the Social Mediating Mechanism for Migrant Wage Labor

I-chieh Fang *

ABSTRACT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dividual’s life course once again experienced a new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Specifically, the contents, tasks and challenges over the course of childhood, youth, and old-age have been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rearrangements. As powerful consumers, the main group of migrants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s, youth and adolescents are especially prominent and worthy of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dream and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future in a Taiwanese-owned factory in Shenzhen. It explores how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adolescents has become a social mechanism for justifying the marginalization process which has taken place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youth and their in-between, belong-no-where situations. At first glance, ‘marketized adolescents’ encourages Chinese youth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istic, emphasizing individual freedom and individuality. But in fact, it is less about the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and more about the way in which state, society and market justify its change after marketization and obscure the resulting social 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Keywords: adolescents, migrant workers, life course, development, global marke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前言：打工之路的夢想與現實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農民工，有時公眾論述會以「新生代農民工」來指稱他們，並認為他們與之前的農民工具有不一樣的特徵與行為模式。在進入新生代農民工的青春之前，我想先從田野的觀察開始說起。工廠裡的青年農民工很喜歡聽流行音樂，也會一起唱流行音樂。他們通常把音樂儲存在他們的手機裡，在工餘時間聚集在工廠的中庭中邊放邊唱。一位跟我相熟的報導人，也是我的室友芹琴，就很愛到休息室去唱 KTV。做為一個中階幹部 ，她有這樣的權利。

芹琴告訴我，她最喜歡的歌有兩首。第一首是「小小」，歌詞說的是一位小女孩抬起頭望著滿天星空，數著一二三，暗自許願，好奇自己的願望是否可以實現，當微風輕輕吹拂她的臉時，有個人從她心底浮現。我聽芹琴唱首歌好幾次，每次芹琴唱這首歌時都非常真誠，會在唱到最高音時用盡力氣。她告訴我，這位歌手是她的偶像，因為她不但漂亮而且還特別有才華。芹琴說她很想要像她一樣。她又說：「或許不是當歌手，而是當個（聰明又有才氣的）作家吧」。

芹琴很喜歡讀《讀者》，這是一本雜誌，專門刊載各種生活小故事與平民百姓投稿的創作小說，題材包羅萬象，涉及歷史、當代社會現況、心情小品、也有一些幽默小短篇。一本讀者要三塊人民幣，芹琴對我說，這是少數她縱容自己奢侈的開銷。2008年的農曆新年，我與她一起回家過年。那年雪下的很大，據說是中國南方五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大雪，許多地方寸步難行，交通阻塞，好不容易回到了她湖北農村的老家，在沒水沒電處處積雪的情況下，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待在家中相互聊天、打麻將、睡覺。那時我買了很多二手的《讀者》，跟芹琴一起打發時間，彼此分享讀後感想，交換心得。那段時間裡芹琴因為不需要工作，反而有更多得時間與我交談。她給我看了一些她寫的文章，是關於她打工的心情、與父母相處的感觸等等。她告訴我，有一天，她希望可以把這些文章投稿到《讀者》去。在工廠工作的十年間，她累積了很多感觸，很想找個方式來表達。回到工廠後，她還是持續的跟我談。有時在睡前的閒聊中，她會突然問我：「到底，要怎樣我才能變成一個作家呢？」或者，她會說：「如果我想要做廣告文案的話，要怎麼樣做才行啊？」就這樣，無數個田野的夜裡，我常常聽芹琴訴說她的夢想，並試圖替她找到一條可以實踐她的夢想的路。但很多時候，我們說著說著，都沈默了。對一個初中都沒畢業，農家背景的打工妹來說，作家或廣告文案，真的是太遙不可及了。「有夢，卻找不到路」是我看著像芹琴這樣的女孩，最常浮現的想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法。

另一首芹琴喜歡的歌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比較陽剛，比較現實。這是一首由男歌手所唱的歌，歌名叫「海闊天空」，歌詞如下：

> 我曾懷疑我，走在沙漠中。從不結果，無論種什麼夢。才張開翅膀，風卻變沉默，習慣傷痛能不能算收穫。
>
> 慶幸的是我，一直沒回頭，終於發現，真的是有綠洲。每把汗流了，生命變得厚重，走出沮喪才看見新宇宙。
>
> 海闊天空，在勇敢以後。要拿執著，將命運的鎖打破。冷漠的人，謝謝你們曾經看輕我，讓我不低頭，更精采的活。
>
> 凌晨的窗口，失眠整夜以後，看著黎明，從雲裡抬起了頭。日落是沉潛，日出是成熟，只要是光一定會燦爛的。
>
> 海闊天空，狂風暴雨以後，轉過頭，對舊心酸一笑而過。最懂我的人，謝謝一路默默的陪我，讓我擁有好故事可以說。看未來，一步步來了。

喜歡這首歌的不是只有芹琴，這是一首普遍流行在我所認識的青年農民工之間的歌。當我坐在芹琴朋友的車上，一路往家鄉開去時，車上的四個農民工一起大聲的唱著這首歌，唱得慷慨激昂。歌詞裡說的情境顯然引發他們的諸多感觸，想起了在打工過程中的起起伏伏。他們遭受許多冷眼與懷疑，而又靠著各種堅持，一路走到了今天。芹琴 14 歲時離家打工，從一個農村小女孩在產線上做著最基本的工作開始，逐漸晉升成一個中階幹部，但又因一次失敗的婚約，現在她又處於一個人生的轉捩點上。開車的是她只有讀完初中的老鄉朋友，最初也是從產線工人開始做起，現在已經開了個一人公司，自己獨立當老闆了。他賺了不少錢，買了一輛 Toyota 的小車到處開。這些農民工，他們心中各自裝滿了屬於自己的故事，都是關於夢想與現實的。

我從這兩首歌開始，是想要說明普遍佔據當代中國青年農民工心中的兩個問題。他們常會問自己「我的夢想是什麼？」，但又同時會問「如果現實世界是這麼的艱難，我要怎麼樣達成我的夢想？」當他們踏上打工的旅途的那瞬間，他們就必須學著去找到一個策略，可以讓他們在夢想、慾望，以及在困難且很常帶來失望的現實間，找到跨越裂縫的方式。

透過觀察分析像芹琴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夢與路，我們將看見當代中國城鄉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的現象。更準確的說，從農村青年的眼光來看移民打工這件事，反應了這個決定往往關乎到他們的青春、未來以及對成年的想像。

這群青年農民工的青春期，恰逢中國經歷市場化，其生命階段的轉換期與社會變遷同時發生，這樣疊合的情形，以下我將稱之為「市場化的青春」。他們出生於改革開放後，市場的力量正以猛烈的力道作用在其身上。當中國經濟正在起飛，市場經濟正值全盛時，也正是他們生命正要往成熟的道路邁進時（transition to adulthood）。青年、青春與青春期在這裡是三個交纏在一起又各自正在發生轉變的概念，互為表裡的成為捕捉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特定切面。我處理「青春」，是因為經濟轉型讓「青春」能夠被商品化、被販賣（下文中將以我在北京所蒐集到的資料作進一步說明商品化在中國脈絡下的樣貌）。「青春期」的內容與過程也因此正在改變，一種論述正在形成，鼓勵青年在青春期去經歷、去感受被市場化所定義的青春，以顯示自己的青春沒有白過。這論述一方面強調「青春無悔」、「青春可以犯錯」 、「瘋狂的玩」、「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另方面強調「青春是圓夢的過程」，「青春是在為未來鋪路」，「應趁這段時間好好奮鬥」好通往市場經濟定義下的勝利，晉身社會菁英。如此一來，青春的內容與任務，在後毛時期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生，正在被改寫重構。以上的過程，我將稱為「青春標準化工程」。青春標準化工程不僅影響著城市青年，也很大程度透過媒體與進城打工，影響了農村青年。

各個生命階段都因市場化而改變，但我特別關注「青春期」。這是因為青春期不僅僅只是涉及生理年齡的增長，更是一個個體想辦法去取得社會肯認，並開啟相應的社會權利、義務與責任的時期。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種道德性與社會性的取得與肯認，才是青年人在「獲得成年」（gaining adulthood）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任務與內容。此外，生命中數個重大決策將會在這些時期做出，例如找工作、決定婚姻對象、取得社會認可以及建立起自我認同等等。結構的矛盾將在年輕人所經歷的各種掙扎、協商與妥協中，被尖銳的暴露出來。

將青春與青春期的變遷具體化的社會行動者是「青年」。在此我選擇「農村青年」做為觀察對象來觀看市場化的青春與青春期的任務與過程的改變。這樣的選擇是根據以下的原因：（一）根據我的觀察，移民打工已是農村青年的通過儀式的一部份，而不僅只是受經濟推拉力影響的行為而已。後毛時期的青春涉及「成長」與「獨立」兩任務的完滿，進城打工被認為是農村青年完成任務的唯一選擇，移民因此成為農村青年在經歷其「市場化的青春」中的必要過程。進城打工彷彿成為一種（想像出來的）社會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讓當代中國農村青年得以在市場經濟中建立起「價值主體」（valuable self）（Brandtstädter 2009）。可以說，藉由進城打工，農村青年渴望得以取得他們在原有的社群（意即農村），或是更大的社會中（意即城市、或整個中國）的社會會員資格。進城打工因而把農村青年個人的、私密的、生物性的青春期成長過程，與更大的社會連結在一起。

當我們去關注青年農民工如何經歷「市場化青春」時，一些問題將驀然浮現：「不同的青年如何經歷相同的青春標準化工程？」、「這樣的青春標準化工程是否有排他性？」、「這樣的青春標準化過程中，是否會再次邊緣化一些特定群體的青年？」，而最重要的是「到底青春的論述，如何起到讓成千上萬的農村青年前仆後繼的往城市移動，去接受不平等的工作條件與薪資，甘願成為世界工廠的犧牲者？」，本文正試圖回答以上問題。

文獻回顧：農民工、青春與全球市場

農民工的研究多如牛毛。從十幾年前就開啟的研究議題多聚焦於跨國資本、國家與父權結構如何聯手剝削農村來的女工、新的階級形成過程在中國社會發生的可能性、素質論述的力道以及城鄉二元體制對於農村人口進入勞動市場後在公民權、身體與存在的差別待遇以及各種憤怒抗爭與反抗的研究（Anagnost 2004, 2006; Pun 1999, 2005; Pun and Lu 2010; Pun and Smith 2007; Solinger 1999a, 1999b; H. Yan 2003a, 2003b）。也有學者研究農村移動人口在城市與農村皆無所適從的主體認同（Jacka 1997, 2005, 2006），另外則有學者研究農民工的匯款或返鄉農民工對農村的影響（Murphy 2002; Woon 1993; Zhou et al. 2008）。而其中，探討農民工的代際差異以及主體變遷的研究（Wang 2001）與本文意圖探討的議題最為相關。代際差異及主體發生轉變的原因，除了來自中國式的經濟轉型，工業化過程中人際關係的轉變，消費主義的興起、城鎮化等結構性原因之外，還來自於打工年齡的降低、打工時的婚姻狀態、農村經濟的改變等。農民工群體也出現了相當巨大的內部分化，讓他們各自所面對的「現實」（reality）大不相同，例如出生在城市的「農二代」，就跟在農村長大的「留守兒童」要面對不一樣的困境，即使他們的年齡相當，也都具備農村背景。富士康跳樓事件發生之後，舉世譁然，更讓新一波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發生。在一波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中，我特別想要聚焦在「青春」為何可以成為階級、性別、素質與城鄉

臺灣大學學術研究資料庫

二元分化等因素之外一個也可以用來有力解釋農民工行為特徵的重要因素，甚至變成公共論述的主要依據。我認為要瞭解新生代農民工，青春確實值得而且必須被納入觀看的視角中，本文將以人類學觀點來填補這個空缺。以下我將先對青春觀點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作一個回顧，再帶入青年與全球化的人類學觀點，為青春的農民工解釋另闢蹊徑。

青春觀點下的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這個名詞被某些學者用來描述生於 1980 年代後的農民工 （Chen 2010; Gao 2010; Li 2009），好把他們從前代的農民工當中區分出來。也有人把農民工區分為三代，把出生於 1970 年之前的稱為第一代農民工，生於 1970-1979 間的為第二代農民工，以及 1980 年後的新生代農民工（Wu and Xie 2006）。根據 2009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超過一億兩千萬農民工生於 1980 之後，這意味著他們佔農民工總數的 60%(Bian et al. 2010; Chen 2010: 79-80; Gao 2010: 9），這也意味著在當代中國，有四分之一的年輕人（年紀在 16-30 歲間） 是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Chen 2010: 80）。

不像第一代農民工（其在離家打工之前，大部分都已經結婚成家了，小孩放在家鄉養育，所以他們恆常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往覆移動）或第二代農民工（其大半也在離家之前結婚，但往往在城市呆上更久的時間，即使這樣會讓他們與他們的伴侶和孩子分住兩個不同的地方), 大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都還處於未婚狀態（Chen 2010; Fu and Huang 2009: 28; Wu and Xie 2006; Yu and Pan 2008）。

近年來，這些年輕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已經吸引了很多學者、記者與政治家的目光，特別是在國務院 2010 年一月在其中央一號文件呼籲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之後 （Chen 2010; Gao 2010）。與國家的立場呼應，許多當時的討論都把新生代農民工當作是一個「問題」來看：視他們是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城鎮化與現代化的阻礙。當富士康（作為蘋果在中國最大的 OEM 廠）發生連續 14 名年輕農民工跳樓事件之後，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議題更一躍成為國際焦點 。這些自殺的農民工年紀都在 18-25 歲之間（Chen 2010）。廠方即使給了雙倍的薪水，仍沒有辦法阻止悲劇繼續發生。如果金錢不是年輕農民工所欲，那下一個問題將是「這些年輕工人是誰？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想要什麼？」。中國（或許是全世界）開始意識到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可能不再是刻板印象中那些順從的、無聲的、願意忍受無止盡的艱苦的世界工廠裡的「生產主體」了，這引發了新一波對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熱潮，試圖能更細緻的去釐清「農民工」這名詞背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各種差異性。

一些中國學者的研究指出，年輕的農民工離家打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受到消費文化的驅使。對於這一代的中國青年來說，他們追求透過消費行為來展現個體性（He and Fu 2006; Yu and Pan 2008）。農民工和他們的父母相比，更想追求「時尚的生活」而不甘於花盡力氣僅為了去維持一個「穩定的生活」（He and Fu 2006; Huang 2010; Li 2009）。因此，移民打工對他們而言，最大的誘因並非是為了賺取薪資，更是為了要過上一種全新的生活（Yu and Pan 2008）。這些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大眾媒體中，也一再被描述成對於自己的家鄉漠不關心，鄉土觀念淡薄（Chen 2010: 80），與費孝通鄉土中國裡所描述的農民已經大不相同。雖然他們出身農村，但已經不再能夠忍受農活的艱辛，也不再與土地有一種無法分割的親近感（Fei 1992），他們似乎正在追尋一種全新的價值，渴求「個人主義式」的生活。他們的行為特徵與他們父母那輩（面目模糊吃苦耐勞的農民工）如此不同，公共論述也很輕易的將之歸結為 1. 市場的影響，2. 生命階段的影響，即所謂「他們還年輕啊，還不成熟，不知道面對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當富士康自殺事件爆發初始，公眾輿論先是以「血汗工廠」來解釋這等慘案的發生，指責工廠的工作環境糟糕、薪資過低、工時過長等等。但之後，輿論開始有了其他聲音，指出富士康雖然鐵腕管理不合人道，但其工作環境與條件與其他深圳的大多數工廠相比還不是最糟的，相對來說它還提供了較高的薪資跟較佳的工作環境，這無法解釋為什麼自殺潮是發生在富士康而非其他工廠。「血汗工廠」之說也無法幫助釐清為何自殺事件是在那個時間點發生（陳中 2010）。其後，公共輿論開始轉向，轉為責怪年輕人自身，認為是他們年輕，其自身的種種「特質」導致了悲劇。[1] 不論是在媒體中或是在一些學術報告裡，年輕農民工被認為是挫折忍受度低，不願意從事髒累苦險的工作，他們對生活缺乏現實感，一心想過城市人的生活，卻沒有考慮到這是不是可能的（Gao 2010）。有些學者分析，這些年輕農民工對於「好東西」的消費慾望，來自於他們是「獨生子女」的一代，個個都是家裡被寵壞的小孩（Chen 2010; Gao 2010: 10），所以也才會無法忍受農活的艱辛，一心想要離家到大城市打工，而父母也因為寵愛青春正盛的孩子想要出門見世面的心情，也就由著他們去。簡言之，這些研究主張，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徵與態度，是中國一胎化政策下的產物。

這些用青春來歸結新生代農民工的行為特徵，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凸顯了青春做為一個生命階段在全球市場的重要性。原本青春期並不是在每個社會文化中都被看重的，特別是在中國習慣把小孩當作小大人來養（Hsu 1971）。但在全球化與市場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之後，青春作為一個生命階段及其主體青年，都被特別的突顯出來。[2] 二是以上用青春來歸結新生代農民工的行為特徵時，卻往往簡單的將之與「不成熟」、「天真」、「不知社會現實」等聯繫在一起，藉此合理化其對於變遷暗藏的價值貶抑，並順勢把結構上的不平等以及其中所牽涉的各種政治經濟因素隱去不見，在「青春」的修辭中四兩撥千斤的轉換成是個人的責任。這一點是值得細家分析的。以下本文將試圖從另外一種「青春的觀點」來解釋青年農民工的行為。

人類學觀點：全球化下青年

人類學在研究青年與全球化時，指出了完全不同的切入點。全球化下的青年，包括中國的青年農民工，都在面對快速移動、工作轉型，以及再生產的重新安排等情況，而這些變遷放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將對青年造成不同的社會後果結果。以下我將討論：一、青春期的擴大，不確定性的延長，二、生命歷程的去標準化，再生產需要重新安排，以及三、青春成為全球市場的代言人等切入點。

青春期的擴大

青春期這個生命歷程的時間段在全球化市場下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一方面，勞動方式的改變對此產生影響，在彈性工作、高度非正式化工作型態湧現時，過往透過以「勞力中心觀」來定義童年、青年、成年、老年的方式，似乎已經不再適用。另方面，難以企及的成年加上童年的提早結束，也讓青春期擴大延長。80、90 年代開始經濟衰退，加上此後金融危機的爆發，造就一堆「啃老族」，讓離家獨立的「成年」遙遙無期。而營養與健康的進步又讓童年期提早終結，小孩子更早熟，要提早負起道德與法律責任並面對競爭，甚至被稱為是「無童年的一代」（Cole and Durham 2008）。當成年難以企及，而童年又提早結束的情況下，青春期的擴大似乎成為一種必須面對的趨勢。

青春期的擴大將產生什麼社會後果？目前似乎還沒有明確的結論。目前許多研究正在鎖定尼特族（NEET），亦即沒有在受教育、受雇以及受訓中的年輕人，這群尼特族青年很可能會陷入貧窮中而無法逃脫，但也可能出於自願（Furlong 2006; MacDonald 2011）。青年貧窮化成唯一個多面向的議題，僅從階級與經濟的角度不再可以充分理解之。

青春期的擴大，也可能是意味著個體生命歷程中不確定性、模糊性、與流動性的擴張跟延長。青年的身份與青春期的階段在社會想像中總是帶著一種「未來性」，亦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它只是一個過渡，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的中間期，而非一種穩定恆常的狀態（Cole and Durham 2008）。這將溢出所有以穩定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理論框架，而呼喚另一種能夠處理「當流動成為一種常模」的新的分析架構（參見 Frederiksen and Dalsgård 2013）。

生命歷程的去標準化

其次，在全球市場的發展之下，我們習以為常的線性的、標準化的生命歷程可能正在去標準化中。Globalife（Life Courses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Buchholz et al. 2009）的研究問題化了我們普遍認定的生命歷程，解構「青年」與「生命歷程」，並更彈性的來看個體如何隨時間（在社會結構中）改變。全球化似乎給人們一個機會，重新去協商「生命歷程」。

而當全球市場下，國家很大程度退出私人領域、社會再生產（如長大、結婚、生子、養育、養老等）因快速變遷的社會情境而從根本的改變其意義（例如親密關係從為生育、到為陪伴，再到為娛樂（Bernstein 2007: 6），之前的實踐方式無法有效的傳給下一代，下一代青年在面對新的處境與社會化的斷裂的情況下，勢必要在新的脈絡中，發揮創意與靈活性，找出可以因應的方法：不管其是傳統的再創造、全球化與地方文化結合的混合物（hybridity），或是在新科技發明之後應運而生的全新方法。生命歷程不再標準化後，社會再生產的領域顯然在呼喚一個全新的安排。生命歷程，如青春，將具體化這種變遷。

青春成為全球市場的代言人

青年具體化了全球化下的機會與風險（Durham 2000, 2004, 2008）。全球化的意象與青年所象徵的機會與風險高度疊合，當全球市場鼓勵並慶祝風險，但也同時帶來快速變遷的印象時，人人都想要寄望未來並預測未來，「青年」作為象徵未來的符碼，將不可避免成為一個權力角逐與操弄的政治領域。

「青年」這個範疇的政治性在於各種社會力在拼比如何去認識、製造、競爭、並自然化「新的未來」（Cole and Durham 2008）。因青年這個符碼與「正向的未來」（意即有希望的未來）常緊密結合，讓國家（或其他社會團體與論述）可以挾持青年作為象徵，鼓吹特定的現代性想像與發展觀。例如：國家與企業使用青年的形象去啟動特定的全球化計畫，即使這些計畫實際上對青年可能是有害的。全球化是一個「歌頌、慶祝風險的時代」，與青春給人的氣息不謀而合，藉著青年的正面形象來歌頌青春掩蓋風險，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合理化了發展國家撤出社會福利、強迫未開發國家接受特定版本的現代化行徑（Ruddick 2003）。

青春因全球市場而改變了其內容與過程，而全球市場正利用「青春」來動員社會行動者接受特定的發展版本與想像，在後毛時期中國，國家與全球市場正在利用青春來宣傳什麼樣特定的發展版本？而對一群青春正盛但在發展計畫中被邊緣化的農村青年而言，他們如何主觀認知這樣的狀況，又對他們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以下我將以我在深圳工廠所蒐集到的民族誌資料進行討論與分析。

田野與研究對象

在進入我的田野材料與分析之前，我將先對於我的田野與研究對象進行介紹。本文的資料主要蒐集於 2007-2008 年的長期田野，並分於 2012 年 4-5 月，2013 年 7 月在北京進行青春商品化的調查，並拜訪與青年勞工相關的 NGO 組織，進行補充更新資料。

我的田野拜訪了四個工廠，三個台商廠，一個陸資廠。關於青年農民工的主要田野是在深圳的台商廠進行。在下文中，我將其匿名為泰效。我的研究資料主要是透過參與觀察蒐集，在進行田野期間，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待在工廠，白天跟工人一起進車間，晚上住在工廠的女生宿舍中。我得到許可，可以自由的在工廠內移動，也可以訪問工人，只要不影響他們的工作即可。因此我訪談了 78 個工人，訪談內容從蒐集三代的親屬圖開始，透過親屬圖，可以基本的掌握住這些農民工的家庭形構，本人與親屬的年紀、兄弟姊妹數與排行、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目前在工廠的職稱與工作屬性、之前工作經驗、移民軌跡與移動的親屬連帶關係等。蒐集親屬圖之後，我接著調查他們受教經驗、工作經驗、移民打工的動機、適應情形、未來的計畫與夢想、薪水的使用情形，家內的男女分工等問題，透過這些問題，來勾勒一個農村青年如何主觀的去經驗市場經濟的圖像。另外我也訪問了各組的小組長，瞭解他們如何看待員工在工作上的狀況，以及管理方對他們各自的評價。我總共採訪了 23 個女性、17 個男性。其中 9 個已婚，32 個未婚。受訪者分別從以下省分來：湖北（11 位）河南（10 位）、江西（4 位）、廣西（4）、廣東（4）、湖南（3 位）、安徽（1 位）、黑龍江（1 位）、山東（1 位）。訪談者的年齡從 16 歲到 42 歲，42 歲是一位女性。年齡中數是女性 20 歲，男性 21 歲。66%的受訪農民工教育程度是初中（包含畢業與未畢業）。以下我將介紹泰

臺灣大學藝術類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效工廠的基本情況。

泰效廠裡多是外地來的農民工。其屬性是電子廠。電子廠對於工人而言，往往象徵著乾淨、現代、高科技與高工資，因此能吸引不少年輕農民工前來。普通話是該廠管裡階層使用的語言。本廠的工人年紀都很輕，平均年齡約 20 歲，幾乎都未婚。他們打工可能有貼補家用的原因在，但更多是為了找到農村沒有辦法提供給他們的機會。他們花很多時間，在廠裡面計畫想像自己的未來。

我在泰效廠裡遇見的年輕移民分別從中國各地不同省分來，其地理上的差距可以跨越好幾個省分。河南來的員工佔最多數（21%, 25），第二多的來自湖北（16%, 19），第三多的來自廣東（13.4%, 16）。還有工人從廣西（11.8%, 14）、江西（9.2%, 11）以及湖南（7.6%, 9）來。泰效廠因為較小，員工數少，人口比例隨時間而發生改變。舉例來說，老員工告訴我以前工廠是湖北來的員工最多，而現在是河南來的員工最多。當湖北員工多時，恰好是湖北籍的廠長夫人跟她廣東籍的丈夫在管理工廠，他帶了很多自己的「老鄉」過來。而現在的廠長是河南人，廠長夫人是廣東人。工廠人口組成與權力的轉移息息相關，甚至有所謂的湖北幫跟湖南幫的鬥爭。

我也很快就注意到工廠裡有很濃厚的「地方知識」。這些「地方知識」去把不同背景的工人分群，用以猜測他們的行為特徵與脾氣。而在這些「地方知識」中，省籍往往是一個分類的重要基礎。很快的，我發現這似乎是合理的作法：在一個相對不確定且充滿未知的環境裡，這些口耳相傳的經驗與知識，似乎是用來衡量與同事們的相處之道的一個簡單便利的方法。即使都來自於同一個國家，他們可能來有著非常不一樣的文化背景、講著不一樣的語言，吃著不一樣的食物，而且各自有很不相同的道德判准。為了讓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為了彼此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相處，工人們總是要找到一個方法，即使很粗糙不精確，來彼此互動。

然而，即使這些工人來自非常不一樣的省分，他們的家庭背景倒是相當類似的。他們大半都是在農村長大，他們的父母都是農民——至少在官方的文件上是這樣歸類的。根據中國的戶籍制度，這些工人都註冊為農民（參見 Knight and Song 2005），由政府提供土地給他們耕種。然而，至少有一半的年輕農民工不知道該如何耕種，且幾乎沒有任何的農業技術、知識與經驗。而類似的觀察，也被其他的研究者呼應（Chen 2010; Yu and Pan 2008）。其中有些年輕農民工，他們名下並沒有任何土地，這有可能是因為他們是在現行的人口政策下屬於偷生的孩子或是他們受到地方土地政策的影響（如二十五年不分地），這樣的現象亦可見於其他研究中（Gao 2010: 10）。

臺灣人類學會版權所有

改革開放後，農村人開始湧進鄰近城鎮或是沿海大都市去「打工」[3]。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年輕農民工都告訴我他們是以「留守兒童」的狀況長大的。所謂留守兒童，是指在成長的過程中，父母有一方或雙方都出門打工，只有在逢年過節時才回家團圓，因此這些留守兒童可能是被祖父母，或是叔伯嬸嬸，或甚至是鄰居照顧長大的 （Ye and Pan 2011）。

「市場化的青春」

在進入工廠的民族誌資料之前，我將先根據我在北京與深圳的田野，描述分析「市場化的青春」在中國的樣貌，辨認出其在當代中國脈絡下的幾個特色。

2012 年夏天的北京，北京地鐵站的燈箱廣告上也佔據了各種各樣以青年人為行銷對象的廣告，用斗大的字眼打著青春的標語，傳播「市場化青春」的典範。諸如：面目姣好的少女站在校園綠道上，陽光從樹影中流洩而下，旁邊是一行標語「青春是一種無所畏懼」。「無所畏懼」四個字特別用紅色大字標示出來。或是在頭綁束帶、身穿背心，露出一身結實肌肉，沒有笑容，眼光犀利的年輕男性旁邊下標語「其實，對手沒有別人，面對挑戰，我敢」，再下方是另一行更大字體的標語「青春不畏行動」，不畏行動四字用紅色字體。最下方則是「XX 易購，敢性青春」，敢性青春四字用紅底反白。同一系列不同版本的廣告，是一位身著舞衣，正以優雅姿勢迴旋的年輕女孩，標語寫著「其實，年輕並不是理由，面對困難，我敢」、「青春不離夢想」、「XX 易購，敢性青春」。這些廣告與標語，大大小小充斥著北京街頭。

市場化的青春其第一個特色是青春正在後毛時期中國以商品之姿大量販賣，其販賣的是一種自由自主的浪漫情懷。非常多關於青春的電影在當代中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小時代」（包括《小時代：青木時代》、《小時代：刺金時代》、《小時代之摺紙時代》）、「中國合夥人」等，其無不鼓吹年輕應與夢想掛勾（不管這些夢想是如小時代般的物質化，或是如中國合夥人的激勵奮鬥），而年輕人應該趁年輕拼命去實踐夢想。例如中國合夥人就被人民日報譽為「終將抵達的青春夢」，片中被剪成預告片到處傳送的宣傳詞為「我們這代人最重要的是改變，改變身邊每個人，改變身邊每件事，唯一不變的就是此時此刻的勇氣，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將改變世界。」

其第二個特色是理想青年形象的改變。對於文革時期一代，理想青年應該是要能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人民服務」。因此黨國體制所推廣的理想青年形象可能是一位半耕半讀的農村小學老師，其全心全意的為貧下中農服務。她與她服務的農村人民過一樣的生活。身穿樸素、中性的服裝，不愛慕虛榮。她願意犧牲她自身的個體性，以及她和自己家庭與朋友的聯繫 來成就集體的目標（Andrews and Shen 2002: 141-143）。改革開放後，標準的理想青年形像已與上述截然不同，就像社會輿論中常流傳的，男青年要「高富帥」，女青年要「白富美」。而相對的，農村青年就被笑做是「屌絲」或是「洗吹剪」（因為他們只能找到在理髮院的工作）。而雜誌媒體在宣傳理想青年時，也刻意去凸顯其個體性，諸如要有白靜姣好的面容，帶著吸引人的微笑，有一雙閃亮的雙眼，懂時尚，知道如何欣賞藝術，常進出美術館等（Andrews and Shen 2002: 141-43）。在農村也有相映的改變，以前找對象要找老實的，現在要找風流的（Yan 2003c）。改革開放後這種新型態的理想青年的形象，亦與中國試圖與國際社會接軌有關，透過新一代具「世界觀」（cosmopolitan）形象的青年（參見 Rofel 2007），來證實中國已經有資格進入國際社會。

「市場化的青春」的第三個特色是獨立成為必須。青年必須獨立，這樣的論述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不盡能成立。但市場化後，青年要「獨立」不但變成首要，且是青年自己的任務了。根據許烺光的祖蔭下（Hsu 1971），傳統上，中國年輕人依賴成人，特別是他們的父母，來取得成年的資格（gain adulthood），其中一個關鍵是透過父母與家族的安排來完婚。而儒家所謂的「三十而立」的立，也並非西方意義下的「獨立」，而是指個體能夠在人倫關係的脈絡下自我修養 （Tu 1998: 28）。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的大家庭理想下，年輕人在取得成年資格時，並不需要經歷與其所成長的大家庭切割的那種西方式的「獨立」。在毛時期 ，相反的，國家盡量想要把個體從「封建」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家庭關係中鬆綁出來，置放在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Fong 2007: 94）。在這段時期，年輕人通往成年的路徑是由國家來設定，國家會在年輕人到達特定年齡時，給予青年人土地，並保證他們有全然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Y. Yan 2009）。在後毛時期，國家很大程度的撤出了私領域，「獨立」，亦即青年人要取得成人資格一事，很大程度的交由市場來規範，並變成是個人的責任（Y. Yan 2003）。

在『具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的青春』的鼓吹下，許多農村青年現在「一腳出校門、一腳進城門」，第一份工作就是進工廠。離家打工，不再是為薪水，而是為了滿足新的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需求，有機會去經歷「市場化的青春」。在田野裡面，我所遇到的農民工，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考慮：我的下一步是什麼？我的條件可以讓我有怎麼樣的工作、對象與未來。簡單來說，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工人」，當工人，只是過渡階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資料庫

段，為了通向下一個的未來。一方面，他們渴望消費與慾望的滿足，另方面他們花很多時間在想怎麼樣「企及成年」，成為社會接受與認可的道德人與社會人 （不管是不是繼續當工人）。「獨立」要求他們對自己的未來負起責任：讓自己長大成人、成家立業的責任。他們進城打工的旅程，正是在經歷一段「青春標準化工程」。農村青年踏上打工旅程，就是被青春標準化工程給啟動的，而他們離家的那一刻，就是青春標準化工程的開始。

這與所謂的素質論述也息息相關。「素質」在改革開放之後已經成為新的度量尺，取代「階級」（class）來衡量公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Duara 1998; Rofel 2007）。所謂素質，是一種國家所提倡的論述，用來評量個人或群體的發展階段。透過消費能力、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來度量。其認為個人與群體的發展階段構成並決定了中國的整體發展。素質的論述，一方面合法化國家從計畫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政策決定，而讓經濟轉型，成為好像是順應人性、滿足個人選擇的決定（Anagnost 2004）。但同時，素質論述也讓社會不平等與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成為人民自己的責任：每個人必須替自我的「低素質」負責（Anagnost 2004; Murphy 2002）。農村人在素質的度量尺下，不但被拒斥在正在飛速發展與現代化的中國社會中，還成為拖垮現代化的人。農村青年的處境尤其弔詭艱難，一方面，青年被認為是當代中國轉型的表徵，象徵著「進步與未來」，另方面，農村卻又被標籤為「落後」的代表。在又進步又落後間的處境中，農村青年的青春階段充滿了難以協調的矛盾。

深圳工廠裡的青春夢

在踏上了打工旅程，去經歷「市場化的青春」的農民工又會經歷什麼樣的處境呢？根據我的田野調查，工廠裡青年農民工的青春夢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見世面」，二是「闖」，三是「去看看」（有碰運氣的意思），四是期待改變的發生。前三者雖然看似相似，但彼此間仍有不同，以下我將一一說明。

「見世面」

「見世面」符合青春標準化工程第一個方向，其像是農民工版的「壯遊」。走出去本身就是目的，而非為了其他。此種夢想讓移動主要是為投資自己（的發展）。Ann Anagnost（2006）認為改革開放後，素質的論述興起，整個社會開始視 body capital 為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個體因此願意挪用更多資源投資在其中。

當我問為什麼年輕工人要行經千里來到沿海大城市來工作，他們告訴我這是因為他們想要「見一下世面」。這些從農村來的年輕人，既沒有錢，也沒有時間去從事所謂的「壯遊」（grand tour）像歐洲年輕人一樣。找一份離家千里又有較好薪水的工作，剛好提供他們一個良好的理由可以邊旅行邊看看現代化的中國城市（對其他們已經透過電視與雜誌有了不少的想像）。他們第一個月的薪水，不是匯回家，也不是拿去消費，往往是拿來償還他們一路旅行到城市上工時，所欠下的債務。

阿柔，一位 THS 廠的 23 歲女工，向我解釋為什麼農村青年打工總是選擇在家鄉以外的地方：

> 不管你未來要做什麼，如果你有（在大城市）打工的經驗，人家就會認為你是一個有見過世面的人。如果你總是待在家裡，人家會覺得你什麼都不懂，很笨，很白癡。

想要「見世面」的渴望可以被詮釋為一種更普遍的慾望：「改變自身認同」的慾望。一個農村青年將不再被認為只是一個農村青年，如果他有在大城市工作的經驗的話。在這樣的渴望之下，打工的地點，會對農村年輕人的認同有決定性的影響。青年農民工心中對於中國的城市抱著階序性的排序：按著它們各自的現代化程度來排序。能到現代化程度高的城市打工，被認為代表著他們所看到與經驗到的現代化程度，這也造就了他們打工後的新認同的價值。在這樣的想法下，導致每個人都想到沿海發展的最好的大城市打工。

舉例來說，從湖北來的絲綢，她十四歲的時候離開家到上海去，之後又到深圳來打工。但上海被認為比深圳更為「現代」，有著在上海五年的工作經驗，讓絲綢覺得自己比其他的同事更加優越。她記得，自己是在 2004 年 3 月 5 日很不情願的離開上海來到深圳（她仍然記得確切的時間），她認為從上海換到深圳是一種「降級」。她會做這樣的決定只是因為她沒有辦法拒絕她的表姐玲玲。表姊玲玲把她帶到上海，又在上海照顧她這些年，要嫁到廣東給一位在深圳當廠長的廣東人作老婆，玲玲婚後就要到丈夫的廠工作，她很希望絲綢可以跟著她一起來。絲綢即使不願意離開上海，也覺得無法拒絕這位一路照顧她的表姊。然而，更有意思的是，絲綢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上海，尤其討厭上海人，因為那幾年的工作經驗讓她覺得上海人愛仗勢欺人又排外。她覺得自己在上海老是被人瞧不起 – 就有點像她現在瞧不起深圳跟她深圳的同事一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一個讓她覺得自己更優越的原因是因為上海那家她曾工作過的工廠是間日資廠，這被認為比台資廠或是陸資廠更佳。因為絲綢把她自己的認同與她打工待的工廠與城市連在一起，因此她認為她自己算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在她的家人、老鄉面前，或是其她跟她一樣背景的同事，她就算是某種程度的上海人或是深圳人了。

「見世面」讓農民工認為自己涉入市場經濟正在起飛的榮景中。之前文獻回顧中曾提到，國家計畫與全球市場不約而同選擇青年為全球市場的代言人，而青年渴望「見世面」則為此種代言的一體兩面：一些不符合代言條件的邊緣青年，拼命的讓自己與全球市場能夠發生關係，即使只是置身其中都好。

「闖」

「闖」更近似青春標準化工程的第二個方向「奮鬥」，這些正直青春的青年，有意識的想要在市場經濟中成功，而不是如上述「見世面」那樣，僅僅想要單純的見證市場經濟的發生就得到了滿足。

當我在工廠裡遇到西河時，他 23 歲。在 THS 的工作是他的第二個打工工作。因為就坐在同一個辦公室，他跟我聊了很多他自己的打工哲學。他認為跳槽是必要的，因為要趁年輕時「多闖闖」，他告訴我「在我 30 歲以前，我要一直尋找有能力有野心的老闆；30 歲以後，我要找一個對我好的老闆。」對於西河而言，來打工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生存，二是發展。他的最終目標是要自己當老闆。他說：「不可能打一輩子工」。18 歲他從中專畢業後，就從湖北農村離開，來到深圳，在一家塑料廠當普工。那時候常有仲介會到他們學校找工人。幾個月後，他就轉到品管部門去。這一步步的轉職、跳槽，最終都是要「闖」出自己的一番事業，也就是「當老闆」。

田野中我訪談 78 個農民工，發現青年農民工特別喜歡跳槽，一個工作可能做不了三個月，就會換下一個工作，這很大程度的吻合了媒體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報導。但背後的解釋則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受限於戶口制度不能簽長期契約，只好四處飄盪（Chan 2010; Zhang 2010）。有些學者則認為這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越來越嫻熟於市場法則（Liu 2007）。對於青年農民工愛跳槽一事，西河給了我一些解釋，他認為「出來闖」才是背後主要原因。當初離家出門打工時，「出來闖闖」就是很大的動機。闖意味著：勇於去做先鋒，即使有一點不顧一切，有點衝動，有點不經考慮。另一位農民工張凡（23 歲，男，老家湖北）說：「工廠是一個舒服的環境。在這裡生活有點懶。在工廠裡做久了，你就沒有想法再出去闖了，除非你有百分之百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成功的信心。」根據大部分青年農民工勾勒給我的圖像來看，來工廠打工是離家打工最安全的一步，通常也是他們的第一步。但他們真正想要的，是從工廠裡面得到可以取得各種不同資源的機會，比方說可以累積個人知識、技術、金錢、人際網絡與經驗，最終成為自己的老闆。在工廠提供的資源上，他們可以為下一步「闖」（出去作老闆）做準備。

這種具備草根萌芽的企業家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農村青年，在制度與資本的聯手下進入工廠倍受剝削與異化，但這卻並不妨礙他們想像自己是全球市場的行動者。這樣的民族誌資料也提醒我們在理解青年農民工時，不應直接把他們排除在「青年是全球市場的代言人」這樣的發展版圖之外，只去關注他們反抗市場的面向，假定這會是他們對於不公平的處境的唯一反應。農村年輕人「闖」的青春夢，聯繫到他們的「老闆夢」，這種草根萌芽中的企業家精神，是青年農民工跳槽的主因，也讓他們在異化剝削的環境中的主觀感受仍帶著浪漫的想像，仍懷著夢想與希望。而我認為這與他們處於「市場化的青春」中有極大的關係。

「去看看」

第三個青春夢「去看看」，不具備「闖」那種草根企業家精神的意味，倒是帶著一點碰碰運氣，賭一睹自己的命運的意味。有種「青春無悔」，不試白不試的味道，希望能藉著青春瘋狂一回，以後才不會後悔。

從阿晴（女，17 歲，河南人）初中畢業之後，她就自己決定不要再繼續學業。主要原因是因為她覺得她從學校裡面學不到任何東西。她說，初中那三年從學校裡學到最有用的知識是「禮貌教育」。14 歲的時候，她就離開家，先跟著一個同村的朋友，來到深圳，待了三個月。這個同村的朋友的父母當時在深圳的工廠裡工作，那個工廠在生產塑膠花。阿晴進到工廠裡面去幫忙包裝產品。她用「去玩」來形容這三個月在工廠裡的經歷。在她的敘述中，這段旅程的主要目的是「出去看看」，而不是為工作賺錢。

三個月後，阿晴又回到河南老家，她的媽媽在家鄉開了一家小雜貨店，阿晴就幫忙看店。不久之後，她又跟著姊姊離開家到浙江杭州的紡織廠去找她六叔，「去浙江看看」。在紡織廠裡很快的阿晴就弄傷了手，所以沒幾個月，又結束了這段短暫的「出去看看」的旅程。阿晴才 17 歲，從 14 歲出門打工到現在，已經換過七個工作了。對她而言，每一次出門打工，不見得都是「為工作」，更多是「出去看看」或是「去玩」。

把打工等同於「去看看」的說法不是只有阿晴在用。志剛也用這個詞來形容他的打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工之路的每一個轉折。志剛（23 歲，男，湖北人）初中畢業後就學著作廚師，後來他覺得廚師的工作太辛苦，廚房很熱但腳總是濕的，所以他就辭掉工作，到上海去做製造業。但在毫無相關知識的情況下到底他是如何找到這份工作的？他說因為當時她的哥哥剛好在上海做生意，所以他就「去哥哥那裡看看」。志剛哥哥的打工之路也循著相同的模式。哥哥大志剛三歲，剛從上海辭工回家結婚。新婚夫妻似乎不怎麼擔心剛結婚就沒工作。我問志剛哥哥的下一步是什麼，有想要找其他工作嗎？他說：「他想要自己開始做點生意」。那想做什麼生意，又要怎麼開始第一步？志剛說：「他可能會去寧夏吧，回族自治區，我們有幾個親戚在那裡賣鞋子，做得挺好。我哥就想『過去看看』」。利用親屬網絡，把成本與風險減到最低（可以住在親戚那裡，並有得吃，得到當地的訊息），然後到一個新地方去「看看」，試試自己的運氣，讓這些農民工把離家打工的決定說的非常的輕巧，也讓他們在辭職與工作轉換間似乎沒有太多的考慮與猶豫。

改變與轉換

第四種青春夢與第一種「見世面」的青春夢有所呼應，青年希望自己能夠證明自身已經從小孩過渡到成人，蛻變成新的主體。

我想指出，對於很多年輕農民工而言，在這段打工的經歷當中，他們真正渴望的是身份的轉換：從孩童到成人，從鄉下的村人到世故的城市人。然而，這種轉換絕不僅僅只是個人的慾望而已，還是一種集體性的社會壓力。在家鄉裡的朋友與親戚也期待著可以看到有機會走出去「見世面」的農民工能有所改變。假如年輕人在城市裡打工了幾年之後，卻無法展現他們的「改變」，他們就會被批評為是失敗者。在這層意義上來說，期待離家的年輕人改變而且成長是一種集體行為。期待在認同上能有所改變（或簡單說，去改善他們的「素質」）已經成為是對離家的個人的集體期待。個人對改變的預期/渴望/期待實是社會態度的反射。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改變」可以被算成是青年農民工所期待，並可以展現給他人看的的成長呢？有些線索或許可以從以下我觀察到的一個案例中看出。我在 THS 附近一家很大的商務酒店中遇到了鳳凰。她告訴我，在來酒店之前，她是在一家全世界知名的大電子廠 PPU 裡工作，其總共有 800,000 員工。她在那裡工作了三年半。就好像城市在農民工心中有排名一樣，工廠也有。因為 PPU 是有名的大廠，為數不少的農民工會想要進到裡面工作，在他們打工的早期階段，還沒有累積任何可供比較的經驗的時候。能進到那種大廠，對他們而言正是所謂的「見過世面」、「看過大場面」。而 PPU

臺灣大學藝術與社會資料庫

的大，也讓它有能力去挑員工，相較於其他的小廠，要進到 PPU 也相對的不容易，能進到 PPU，也意味著較高的工資與穩定的合約。　但是，鳳凰卻告訴我，她決定要辭掉 PPU 的工作，因為她再也受不了每年過年回家都被親友嘲笑的境況了。她的親友會笑她說：

> 你離開家到城市待了那麼多年。告訴我們為什麼你的穿著打扮依然看起來像個農村人？你看起來還是笨笨的，一點也不靈巧。你打工時到底學到什麼？你從大城市來，不應該看起來還是一樣啊。看看你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學們！他們看起來多漂亮啊！

因此，鳳凰辭掉了她 PPU 的工作並且跳槽到了酒店，在那裡，她幫生意人按摩。與工廠裡一陳不變的作息相比，鳳凰認為酒店的工作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機會讓她變成一個會說話、懂時尚的年輕女人，像他的親戚朋友所期待的理想青年該有的樣子。鳳凰很快的，在酒店中，認識了一個男性朋友，這位男朋友有錢又多金，期望鳳凰可以當他的「女朋友」。鳳凰跟我聊天時，語氣中透露出又期望又害怕的心情，他不知道這個男性朋友值不值的信任，但她是第一次被人稱讚漂亮，被人認為有吸引力，這又讓她心中充滿了甜蜜的感覺。鳳凰最後告訴說：「工廠太無聊了，給我再多薪水我都不會回去。」我問她爸媽對她換工作的看法呢？她說：「還沒告訴他們呢，說了肯定罵。」鳳凰的決定讓我深覺得震撼，對於青年農民工而言，跳槽到下一份工作，可能不是出自於經濟上的考量，例如考慮薪水、穩定聘僱、福利、工作條件…理性的算計在這裡比不上對於青春的渴望：談戀愛、讓自己改變、變得被人欣賞、被人喜歡……才是她們心中的首要選擇。那男性農民工呢？以下我將舉飛飛的例子。

飛飛，一個 19 歲從湖北來的農民工，告訴我，從他的觀點來看，農村的生活其實比較自由。他可以睡到自然醒，他可以自己決定該怎麼使用他的時間。但在工廠裡，他必須要在車間工作約 12 個小時（含加班），一週 6 天。嚴格的工作流程意味著他幾乎沒有個人的時間。即使如此，飛飛仍然認為這樣的改變是件好事，而且他個人覺得對此感到開心。他說：「在農村裡的生活太懶散太舒服了。現在的我已經不一樣了，不像以前只會玩，我感覺成長了，可以向父母社會證明自己是有用的」。不久之後，我聽到類似論點從廠長的口中講出來，那是一個工廠例會的場合，廠長希望員工們可以擺脫農村人懶散的習性，變成一位有用的、向上進取的、爭取效率的好工人。年輕農民工似乎像海綿一樣的吸收這些廠方灌輸給他們的新價值。飛飛似乎就準備要全心擁抱這樣價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問題是，為什麼飛飛，以及其他的農民工要全心擁抱這樣一個可能是正在剝削他們的系統，而不是反抗呢？飛飛的順從，可以關乎他對美好未來的想像，意即，對於自身認同與身份地位改變的期待。農民工來到城市打工，是為了找到普遍認為農村沒有辦法提供給他們的更好的生命機會，即使這樣的生命機會充滿不確定與未知。他們已經聽到太多激勵人心的故事，透過他們的鄰居、朋友與大眾媒體，關於一個打工子弟如何一夕之間改變他們人生，甚至有活生生的例子就發生在他們周遭。即使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他們還是很願意「來看看」。可以說他們是抱著賭一把的心境來到了城市：拿他們的青春去賭一個未來。

當我與工廠裡的其他青年農民工討論這個議題時，他們普遍同意「改變」是他們意圖在打工過程中尋求，且被（家人親戚）預期是會發生的。當我請他們具體化何謂改變時，他們給了以下的答案。首先，青年農民工應該要變得「會說話」。其次，他們應該要變得「會打扮」或懂得其他現代的事物。第三，他們應該變得更聰明、更精明能幹些。這些期待到底是從何而來呢？這主要來自於電視劇裡面描繪的城市生活，其構築了農村人對城市的期待、想像與幻想的基礎。當他們從農村離開時，他們想像的是這樣的生活的到來。

這幾種青春夢，呼應著「青春標準化工程」對青春新的內容與任務的重新定義，前三者鼓勵青年能夠藉著市場的「冒險」特質去達個人的「青春無悔」，第四種青春夢則呼應著青春浪漫敘述中強調個人的成長來自與過去與家庭的斷裂。而這些夢想，都不約而同的強調市場經濟中隱藏的價值：勇敢、努力與圓夢。其中對於自我提升、自我要求的呼求與鼓勵，看得到素質論述的影子，工廠灌輸的新價值觀也呼應著因應國家發展計畫而起的素質論述。

市場化青春所遮掩的真實情節

然而，青年農民工很快的就發現，工廠裡的生活並不是如農村集體想像中那般的多采多姿。工廠裡的日常生活總是日復一日，能遇到的能交談的也多半都是與自己相似的農民工而已。一般來說，在工廠裡能夠變成朋友的都是那些有著類似背景的人。此外，工作時間常常非常的長，農民工很少有休閒的時間，即使有，他們也常常把休息時間花在附近的大超市或是附近的夜市中，這些都仍然屬於工業區的一部分。事實上，真正的城市，深圳市，還在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之外。從工廠下班之後走在街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資料庫

上，農民工能看到的就只是無盡的廠房，一棟接著一棟，以及許多背景類似的年輕人穿著不同工廠的制服走在路上。

農村青年對於成長渴望卻剛脫離稚嫩的兒童時期的狀態，讓他們更容易被工廠給規訓。工廠管理者利用青春介於孩童與成人之間的特性，發展出一套修辭，來合理化其管理：將對工人行去技術化、否定其協商能力的管理以「兒童化」工人來進行，另方面，又在要求工人該負起生產責任，行自我剝削時「成人化」他們。「像個大人！」、「你還是個小孩」變成一個修辭的容器，讓管理者可以任意的裝載各種控制工人的指令，並合理化且遮蔽了其中的權力關係。

工廠主有時候會說：「我只要我的工人聽話就好，我只需他們的手，不需要他們的口與腦。」這種去技術化的管理並非新鮮事，工人在被切割的工序上，無法看見工作的全貌，因不具備對於工作流程、時間與應有報酬的知識，而沒有發言權。工廠管理方因此成功的弱化了工人對於工作的掌控能力而更能有效的控制他們（Braverman 2009）。但這樣的全控管理常引發工人的反抗，此時「兒童化」工人變成是一套可以「製造甘願」的論述與修辭（Burawoy 1979）：「你們還小，沒有知識、沒有背景、沒有經驗，來就是要多學習，把握機會好好學習，才能成長。」工廠管理者以愛之名，來對工人們動之以情，像家長般的照顧工人的各方面。除了工作上的提攜之外，也照顧他們工作以外的事，如婚姻、家人與家庭。當管理者以家長自居，彷彿把工人當成兒童一樣，要求他們任由「大人」來替他們「兒童」決定什麼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經濟關係上就免不了與生產之外的各種社會關係牽扯在一起，而這些新建起的社會關係，也因此充斥著情感、愛、照護與互惠關係。當工廠謠傳鬧鬼，宿舍裡年輕女工因為莫名的敲門聲在夜裡相擁哭成一團時，女性部長到宿舍去與女工們同住了幾晚，安撫她們。工廠管裡中充斥著由情感關係建立起的「兒童化」照護管理，也讓本來會招致反抗的去技術化管理方式，因而得到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閻雲翔（Y. Yan 2010）曾主張，現代管理模式進入中國企業之後，可能將為中國帶來新一代的企業主體（enterprising self）。兒童化青年農民工，反而將合理化家父長制的管理方式，並鬆動破壞所謂現代管理模式可能帶來的主體改變。但閻雲翔所謂的企業主體也並非不存在於工廠中，這就涉及到「成人化」青年農民工的面向。

在要求工作效率，或是爭端發生，追究責任時，年輕工人就是清楚的被分類為「成人」，被要求要擔負起相應的責任。這時候工廠的各種規則會被拿出來替這樣的要求背書。但另外一些場合，「成人化」的要求則較無關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與精神，而在地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一種強調脈絡與關係的道德性要求。他要求「成年人」應該要能夠自然的召喚出一種更圓融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要求員工若夠成熟，就要能夠「看人臉色」、「會做人」等，若無法做到這些要求的年輕員工，則會被斥責或是評價為生嫩、未成熟。

年輕農民工處於「青春」的狀態中的生物性事實，似乎讓工作場所中公與私的界線變得模糊且可以穿透，更讓家父長制（Paternalism）在工廠裡成為一個合理，而且必須的存在。

以下我將以一個表格來概括農民工在工廠裡經歷的「現實」：家人恆常分離、強迫性的多地往返以及工作的高度非正式。

	中國政策	市場化	結果
家庭	城鄉二元體制下，發展不均，幽靈化的農村，社會關係碎裂化	鼓勵親密	家人恆常分離
生活	戶口制度下，再生產部分不受社會保障，移回農村	鼓勵獨立	多地往返
工作	戶口制度，很難簽長期契約	鼓勵競爭	跳槽頻繁，高度非正式

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外出打工的農村青年經歷家人恆常分離，生活與工作恆常分隔兩地。在鼓勵親密、鼓勵個人表達個人情感的後毛時期社會（Rofel 2007; Y. Yan 2003），他們的親密關係（如父母、夫妻）卻往往是體會到分離、破碎與不連貫。這使得農村家庭代際之間發生嚴重斷裂。我在工廠裡遇到的農村青年要不就是對他們的父母一點也不尊重，要不就是不期待父母給予任何幫助的態度，有時候是相當明顯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在我拜訪絲綢家的期間，她不停的告訴我她覺得她的父母一點都不瞭解她，她也跟他的父母「不熟」，特別是與她的父親，也在彰顯這種代際間的斷裂。這種斷裂也導因於很多青年農民工的童年，很常都是以「留守兒童」的狀態度過的事實。

我的田野調查發現青年農民工一般而言並沒有太在乎他們父母的建議，因為他們普遍認為，父母在成長過程中的經歷不能夠適用於她們現在所面對的狀況，父母現在對世界的看法，也往往與他們所面對的世界無關。如上所述，作為第一或第二代農民工，父母往往在移民打工之前就已經結婚。他們打工主要是要賺錢貼補家用。但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出外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旅程中「看見未來」。當他們想像欲求的未來與他們的父母是那樣不同時，他們實在無法信服他們的父母會幫上什麼忙。在

臺灣大學圖書館學術資料庫

快速變遷的世界裡，前代人的經驗似乎是不具價值的。這也意味農村青年進城打工之後，就必須獨自面對「看見未來」這樣一個人生課題。

事實上，父母也缺少自信可以去堅持他們的子女應該遵從他們的教誨。文化反哺（Zhou 1999）現象也在農村發生。雖然父母仍然認為引導孩子長大仍然是身為父母的責任，雖然子女仍然認為對父母行孝道仍然是理所當然，但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父母仍然隱隱約約的推著她們的子女去外面尋找其他的「行為榜樣」（role models），子女也意識到，他們就是要在沒有父母引導的情況下想辦法「長大」。

除了家庭的碎裂與代際的嚴重斷裂之外，為維持基本的生活，多地性對青年農民工而言已經成為常態。他們在城市裡販賣勞動力，當他們不再被市場需要，或是與市場無關的活動，他們都必須想辦法移回農村進行，比如婚姻嫁娶、養兒育女與養老退休等。然後他們就在不同的地點間來回奔跑，靠著移動來連結與延續被市場切碎的生活與生命歷程。工作上，因為戶口制度下強加的多地性，他們不可能簽長期契約，能做的工作則高度非正式的特質。這種高度非正式的工作，也不只是暫時發生而已，很有可能就會成為他們的常模而終其一生。

中國農村青年在工廠裡的「現實」，很大程度反映了全球市場下典型的青年處境。家庭網絡與功能的碎裂、多地往返以及工做得非正式性，都讓工廠裡的「現實」與移民打工時許下的夢想距離遙遠，無從妥協。這些落差，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均與社會衝突。但這些社會矛盾與衝突，又在「青春」的中界下，成為青年農民工可以接受，並帶著一點浪漫色彩的「旅程」。

青春作為一種中介機制

以上我們已經看到，市場化的青春在農民工的版本中，其青春夢與工廠的現實之間，有一個難以跨越的巨大的裂隙，此時青春變動不安的特性，以及強烈的過渡性，就變成容易在象徵上創造出意義操弄的空間，來合理化農村青年所經歷的上述幾種現實。青春做為一種論述，也作為一種社會機制，模糊了一整代農村青年在當代中國所經驗到的動盪不安與流動模糊的社會現實，也讓國家社會迴避掉中國當前的發展政策對於新生代青年農民工的忽視與結構性歧視。以下我將說明青春為移民打工所帶來的幾個合理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合理化家庭的碎裂與居無定所

如前面的小節所討論過的，「獨立」的意義在當代中國發生改變，伴隨著西方的「青春浪漫敘事」引進到社會當中。「獨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中如果意味著個體知道如何在社會網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自我修養，那「青春浪漫敘事」的引進，就完全顛覆了這種對青春的想像。

所謂青春常常召喚出一種浪漫敘事，這個浪漫敘事說著這樣的故事：「隨著生命的開展，青年勢必將成唯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擁抱新的認同，而這終將在他們與長輩間製造張力，也讓他們與過去發生斷裂。」（Cole and Durham 2008）。這樣的青春浪漫敘事不是舉世皆然的。在很多非西方文化中，重視的是相反的價值。在全球化的風潮下，青春浪漫敘事也遷行擴散到各個文化中，被各地的年輕人擁抱。市場化的中國也不利外。

這樣青春敘事的轉變帶來兩個後果，首先合理化農村家庭在代際之間的嚴重斷裂，以及青年成長過程中家庭網絡的消失或碎裂化。農村青年因為家庭代際關係嚴重斷裂，而必須離家尋找另類成年的事實，就在「出來闖」「看世界」「青春無悔」「青春不怕犯錯」的修辭之下，讓「不得不的選擇」被掩蓋美化成一個「浪漫的選擇」，也讓他們正在經歷生命危機的處境，變成是「被寵壞的小孩」的行徑。

合理化不平等與無法融入社會的邊緣處境

青春浪漫敘事的第二個後果是讓農村青年無法融入社會的處境變得合理可以解釋。若仍從傳統中國的「青春想像」來判斷，這群青年農民工並無法將自己安置在任何一個社會網絡中自我修養，是無法符合「獨立」的定義的。工廠裡的人際網絡是不穩定且變動快速的，必須依賴很多刻板印象來勉強達成與陌生人間的合作。這種從傳統的角度來判斷，農村青年進廠之後的處境完全堪慮。但在西方「青春浪漫敘述」的中界之下，這種無法融入社會的邊緣處境，也變成只是在彰顯「青春的姿態」。似乎這種在社會中無從安放自己，找不到自己定位，被社會網絡排除的處境，只是呼應著「青年要成唯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擁抱新的認同」的過程。這過程也「讓他們與過去發生斷裂。終將在他們與長輩間製造張力」。

以依據「我還年輕嘛」，以及「反正他們還年輕嘛」，農村青年在中國當前發展計畫中被排除、被邊緣化的處境，似乎就變成只是青春的特徵，也讓社會、國家以及市場可以拖延去面對處理這一代農村青年問題的時刻。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合理化剝削與特定的管理方式

雖然工廠生活是讓人失望的，渴望改變的心情仍然沒有改變。這導致青年農民工存在一種有趣的心態：他們興致勃勃的想要學習新事物，且歡迎任何新事物，不管那是什麼。他們面對新價值與論述的態度是高度開放的，有時候甚至是傾向輕易接受的（至少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工廠廠方會試圖對這些年輕農民工灌輸一些特定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脈絡下，就很容易成功。

結論

本文試圖以青年農民工「市場化的青春」為例，來解釋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分層可能發生的鬆動，與旋即產生的收編機制。青春與成長的二元分立、青春的短暫，抑制了社會變遷的動能，讓規訓變遷的動能找到了論述話語。

漂泊流浪與奮鬥圓夢這種市場帶來的全新的「青春標準化工程」作用在青年農民工身上，就成為合理化了他們大規模外出打工，落得無所歸屬與平行流動甚至向下流動的漂泊，也化解了國家、社會與農民工間的張力，並讓制度性問題看起來個人化且具暫時性。

生活的斷裂與工作的轉型都是很大的問題，青年農民工必須在有限的選擇下，以更有創意的方式來面對。其在呼喚社會變遷的動能，但這些動能都在青春的話語下被規馴：規馴成為暫時的青春的脫軌現象，只要生命歷程的階段一結束，就會回歸到常軌。

最後我們要問，若市場化的青春夾帶著一套浪漫敘事進入中國農村青年的心中，鼓勵作夢與圓夢，那青年農民工究竟是在圓誰的夢？農村青年前仆後繼前往城市，靠著對於青春的浪漫想像，讓國家社會以最低的成本汲取他們的勞動力，使他們甘願成為中國高速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的貢獻者，也同時成為城市人眼中必須存在的落後「他者」。可以說，這一群農村青年的青春夢，幫助實現了中國夢。若農民工的青春夢等同於中國夢，那在強調夢想的當代中國，是否要給青年農民工一點線索，那倒底他們的中國夢可以怎麼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　註

1.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是沒有遭受挑戰。有些新聞報導責怪不恰當的管理，而有些強調社會矛盾的激化。還有些官員與教授怪罪於不可信賴的法治系統與不負責任的地方官員。

2. 為什麼青春被突顯出來呢？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原因：（一）是因為青年常常是移民與消費的主體，青春因此成為相對重要的生命階段，（二）青春更容易被商品化，販賣的是一種自由自主的浪漫情懷，（三）青春反映了社會變遷，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代際差異容易成為一般大眾描述捕捉變遷的簡易修辭。新生代農民工可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成為市場化以及一胎化數十年後，中國社會用來理解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遷的一個指標。

3. 在中國大陸脈絡中，只要不是自己當老闆，為薪水而工作都叫打工。

引用書目

陳中

2010　〈富士康員工抱怨但不離職：薪資比外面好〉。DoNews，http://www.donews.com/it/201005/99023.shtm，2010 年 5 月 28 日上線。

Anagnost, Ann

2004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16(2): 189-208. DOI: 10.1215/08992363-16-2-189.

2006　Strange Circulations: The Blood Economy in Rural China. Economy and Society 35(4): 509-529. DOI: 10.1215/08992363-16-2-189.

Andrews, Julia F., and Kuiyi Shen

2002　The New Chinese Woman and Lifestyle Magazines in the Late 1990s. *In* Popular China :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Perry Link, Richard P.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Pp. 137-16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ernstein, Elizabeth

2007　Temporarily Yours: Intimacy, Authenticity, and the Commerce of Sex. Chicag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andtstädter, Susanne

2009 Fakes: Fraud, Value-Anxiety, and the Politics of Sincerity. *In* Ethnographies of Moral Reasoning: Living Paradoxes of a Global Age. Karen M. Sykes, ed. Pp. 139-16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ian, Guiping, Zhaoxia Zhang, and Jing Jiao

2010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ory Probe: 95-97.

Braverman, Harry

2009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Work and Life: 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 Massimiliano Mollona, Geert De Neve, and Jonathan Parry, eds. Pp. 111-128. London: Berg.

Buchholz, Sandra, Dirk Hofäcker, Melinda Mills, Hans-Peter Blossfeld, Karin Kurz, and Heather Hofmeister

2009 Life Courses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Modern Societ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1): 53-71. DOI: 10.1093/esr/jcn033.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n, Kam Wing

2010 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 The China Review 10(1): 63-94.

Chen, Rongwu

2010 The Sociological Reflection on Suicide Events of "After 80s, After 90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 Start with Foxconn Series Suicide Events. The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6: 79-85.

Cole, Jennifer, and Deborah Durham

2008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mporality. *In* Figuring the Futu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mporalities of Children and Youth. Jennifer Cole and Deborah Durham, eds. Pp. 3-23.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Duara, Prasenjit

1998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7(3): 287-308. DOI: 10.1111/0018-2656.00055.

Durham, Deborah

2000 Youth and the Social Imagination in Africa: Introduction to Parts 1 and 2.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3(3): 113-120. DOI: 10.1353/anq.2000.0003.

2004 Disappearing Youth: Youth as a Social Shifter in Botswa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1(4): 589-605. DOI: 10.1525/ae.2004.31.4.589.

2008 New Horizons: Youth at the Millennium.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1(4): 945-957. DOI: 10.1353/anq.0.0036.

Fei, Xiaotong

1992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 Translation of Fei Xiaotong's Xiangtu Zhonggu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ng, Vanessa L.

2007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the Perceived Inadequacies of Chinese Only-Children. Ethos 35(1): 85-127. DOI: 10.1525/eth.2007.35.1.85.

Frederiksen, Martin Demant, and Anne Line Dalsgård

2013 Out of Conclusion - On Recurrence and Open-endedness in Life and Analysis. Social Analysis 57(1): 50-63. DOI: 10.3167/sa.2013.570104.

Fu, Ping, and Sha sha Huang

2009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our Worlds". Youth Studies 2009(4): 24-33.

Furlong, Andy

2006 Not a Very NEET Solution Representing Problematic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Among Early School-Leavers.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3): 553-569. DO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1177/0950017006067001.

Gao, Rongzheng

2010 Focusing on the Issue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Rural Economy 12: 9-12.

He, Ruixin, and Huifang Fu

2006 The Change of Value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hina Youth Study 4: 9-12.

Hsu, Francis L. K.

1971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uang, Jin

2010 The Values System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3: 90-92.

Jacka, Tamara

1997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Finding a Place: Negotiations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mong Rural Women in Beiji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7(1): 51-74. DOI: 10.1080/1467271052000305269.

2006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

2005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Wei-dong

2009 The Study of Adapta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4: 29-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u, Sian Victoria

2007 Social Positions: Neighborhood Transitions after Danwei Working in China. *In* 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Ching Kwan Lee, ed. Pp. 38-55. London: Routledge.

MacDonald, Robert

2011 Youth Transitions,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Journal of Sociology 47(4): 427-444. DOI: 10.1177/1440783311420794.

Murphy, Rachel

2002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n, Ngai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2): 1-18. DOI: 10.2307/2667638.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un, Ngai, and Huilin Lu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5): 493-519. DOI: 10.1177/0097700410373576.

Pun, Ngai, and Chris Smith

2007 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Its Place: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1(1): 27-45. DOI: 10.1177/0950017007073611.

Rofel, Lisa

2007 Desiring China :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Ruddick, Sue

2003 The Politics of Ag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Youth and Childhoo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ipode 35(2): 334-362. DOI: 10.1111/1467-8330.00326.

Solinger, Dorothy J.

1999a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4(3): 455-478. DOI: 10.2307/2658206.

1999b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u, Weiming

1998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Wang, Chunguang

2001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Hobo and Merger of Urban and Rural. Sociological Research 3: 63-76.

Woon, Yuen-fong

1993 Circulatory Mobility in Post-Mao China: Temporary Migrants in Kaiping County,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7(3): 578-604. DOI: 10.2307/2547101.

Wu, Hong-yu, and Guo-qiang Xie

2006 The Characteristics, Interests Claims and Role-changing of Workers of New Generation from the Rural: A Survey in Tangxia Town, Dongguan.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21): 21-31.

Yan, Hairong

2003a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Neohumanism: Organizing Suzhi/Value Flow through Labor Recruitment Network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4): 493-523. DOI: 10.1525/can.2003.18.4.493.

2003b Spectr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interpreting the Labor Mobility of Rural Young Women in Post-Mao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0(4): 578-596. DOI: 10.1525/ae.2003.30.4.5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an, Yunxiang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ural Youth and Youth Culture. *In*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Charles Stafford, ed. Pp. 109-132. Oxford: Berg.

2010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489-511. DOI: 10.1111/j.1468-4446.2010.01323.x.

Ye, Jingzhong, and Lu Pan

2011 Differentiated Childhoods: Impac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8(2): 355-377. DOI: 10.1080/03066150.2011.559012.

Yu, Xiaomin, and Yi Pan

2008 Consumer Society and Remaking the Subjectivities of "New Generation of Dagongmei". Sociological Studies 3: 143-171.

Zhang, Huafeng

2010 The Hukou System's Constraints on Migrant Workers' Job Mo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1): 51-64. DOI: 10.1016/j.chieco.2009.10.002.

Zhou, Yingying, Hua Han, and Stevan Harrell

2008 From Labour to Capital: Intra-Villag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1988-2006.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515-534.

Zhou, Xiao-Hong

1999 Cultural Feedback: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Yingyong xinli yanjiu(Applied Psychology Research) 4: 2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